

DOI:10.12154/j.qbzlgz.2019.03.003

从北美“中国研究”发展历程看智库研究范式之转变*

袁曦临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1189;东南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96)

吴琼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 210005)

摘要 文章通过全面梳理北美中国研究的研究主题、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发现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北美“中国研究”通过拓展研究主题、转变研究方法、完善研究资源收藏,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一个方面表明,智库研究范式的变化与转移,对于智库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 智库研究 研究范式 中国研究 区域研究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ink Tank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Yuan Xi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211189;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 Nanjing, 210096)

Wu Qiong (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 Service, Jiangsu Branch, Nanjing, 2100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s are all changed in the area of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top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broadened the horizon of "Chinese Studies", it is crucia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The ability to contribute valuable and feasible research method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raising broad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Keywords think tank research, research paradigm, Chinese Studies, regional study

1 引言

智库研究因其主要面向复杂的国际国内现实问题,尤其强调研究过程的严谨,研究结果的客观中立,研究方法的科学可行,对于研究方法的开发创新和规范使用有着更为严格与迫切的要求。现阶段我国智库研究主要围绕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展开,通过追溯社会问题的历史轨迹,寄寓现实关怀;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一带一路、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政治经济制度建设、社会转型等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资政经

验。因此对于智库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创新有着深度需求和广泛呼唤,智库研究范式的变化与转移日益成为关注重点之一。

2 智库研究方法层面的发展态势

随着研究复杂性的增强,已经不再可能仅仅通过资料的收集整理、描述阐释来完成智库研究,虽然资料 and 数据的收集、发掘和整理极其重要,但这仅仅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步,只是用以证明或证伪某种判断、猜想和假设的依据,而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能从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高校智库协同发展模式及其路径选择”(编号:ZDIXM018)的研究成果之一。

资料和数据中发现、归纳并提炼出对于当下或未来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有价值的规律和普遍经验。现代决策理论越来越强调基于证据循证的科学决策,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具有量化实证和模型模拟类的研究方法受到更多重视,多学科合作交融已经成为主流。例如近年来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领域的研究,就推动了交通史、文化交流史以及边疆史、民族史的研究,而且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拓展了海洋史的研究范畴,智库研究多元化的局面正在形成。

与此同时,能否贡献出新的、有价值的、可行的研究方法成为一个智库获得广泛认同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兰德公司为例,兰德公司设立弗里德里克帕蒂(Frederick S. Pardee)兰德研究生院,其独特之处在于学生与兰德的分析师一起工作,解决智库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学院专门设有“Pardee 研究生院与新兴政策研究与方法部”,下设6个研究中心,专门负责研发各类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工具:(1)应用网络分析与系统科学中心,主要研发网络指标与描述性统计、可视化、网络统计模型等工具方法;(2)定性和复合方法中心,主要针对半结构化访谈与聚焦、文化域分析、基于术语的主题方法、语料库;(3)博弈论研究中心,面向博弈、仿真和建模;(4)因果推理研究中心,包括工具变量、偏好计分、随机学习、回归不连续性等;(5)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中心,主要针对预警分析、决策支持、思维模式、行为试验、模型与行为试验;(6)可扩展计算与分析中心,包括大数据技术、算法等^[1]。

2.1 量化的实证研究趋向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巨大成就,如何从理论和模式层面进行解释一直是学界,也是全世界瞩目的问题,但仅仅阐述观点、描述过程和个案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合乎规范的数据和论证范式,才能减少模糊不清的争论,为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之间的讨论和交流提供事实基础,为科学决策提供扎实的事实依据。欧洲自19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注重将数据的统计学方式引入史学研究。就经济史研究而言,西方经济史的研究者基本是经济学家,代表人物 Robert William Fogel 和 Douglass Cecil North 1993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Fogel 的《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的诞生;而国内相应领域的研究仍以

史学家为主,由于欠缺量化研究的方法训练,故较难有效解释我国经济与制度的变迁。

无论是在历史学,社会学领域还是人类学、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基于数字计量的研究是大势所趋,综合性的智库研究领域更是如此。例如通过收集并统计某地区一定时期内社会各阶层的人数及其收入状况,可以计算出该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即平均数),以及中产阶级的收入(即中数),发现该地区各阶层人口的收入集中趋势;再通过标准差计算,推演出个人收入与人均收入的差异,即离中趋势;而后将中数和平均数进行比较,得出该地区经济收入是否呈偏态分布及偏态的正负。在此基础上政府出台各类型政策等,调整政府决策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联系。采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对研究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以事实和数据为论据支撑,完成复杂的社会研究,能够有效避免基于个人认知和社会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导致的研究结论的偏差。这一点对于智库研究而言尤其重要。

2.2 整体与区域并举的研究趋向

受还原主义影响,学科发展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专业。与此相对应,对于整合研究的呼唤也一直没有停歇,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渐成趋势。整体主义(holism)研究范式就是从整体性的角度(holistic approach)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行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58年发表了重要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认为历史时间有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之分,短时段主要是突发的历史现象、事件如革命、战争、地震等;中时段是指一定周期和结构的局势或社会时间,如人口消长、生产增减;长时段属于历史的深层结构和基础,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等。长时段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智库研究面向的是国际国内的政策制定和决策支持,如果没有宏观的视野,从整体予以考虑,而仅仅从一个学科的知识来分析^[2],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过于细致的研究,容易扭曲问题本身,带来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对于现实问题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政策建议。因此,整体研究符合智库研究的要求特点。

与此同时,智库研究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学科内部问题,故智库研究同样需要具体而微的分领域、分区域探究。2012年南海中心获批为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中心依托地理信息、海洋海岛研究、边疆史学、文献

情报、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学科优势,以问题导向和任务驱动,带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等层面的南海问题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基础信息与决策支持服务。中心下设若干协同创新平台,包括南海环境资源研究平台、南海法律研究平台、国际关系研究平台、南海史地与文化研究平台、南海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平台、南海动态监测与形势推演平台、南海地区航行自由与安全合作研究平台、南海舆情监测与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南海问题政策与战略决策支持平台^[3]。

3 智库研究范式转变的路径分析:以北美“中国研究”为例

“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是智库研究中一个蓬勃发展的重要门类。而“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是美国“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明显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中国研究”和传统“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早期汉学(sinology)范围很窄,被限定为对古代汉语文本的语言学研究。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Schafer)甚至认为“汉学即是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4];自哈佛大学费正清的研究开始,“汉学”研究发生转向,越来越倾向对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哈佛大学成立了“国际与区域性研究委员会”,有关中国文化演变、社会流动、经济体制、税收政策、政治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课题越来越多,中国研究遂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研究。

3.1 “中国研究”的主题日渐开放

就北美“中国研究”而言,至少历经过3次研究问题域的转变和调整。

最初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及其同辈研究者为主,通过对19世纪西方霸权所缔造的世界秩序的考察,关注东亚世界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角色和意向,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和全球秩序之间的关联等^[5]。诸如费正清早期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等,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研究。

当然,在研究的视角和认识切入点上是有变化的,费正清等研究者多从“冲击—回应”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而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研究已经放弃“冲击—回应”立场,转向保罗柯文(Paul A. 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论”。作为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中国中心论”从中国人自身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近代发展变迁^[6]。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是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层组织,并且运用大批地方志的材料与回忆录来分析团练组织和地方社会的关系;选择从区域研究的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身所发生的变化。相关研究还有:楼兹(Edward J. M. Rhoads)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间的广东省》(*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凯普(Robert A. Kapp)的《四川与共和中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1911—1938》(*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舍登(Donald Sutton)的《地方军阀与共和中国:云南军1905—1925年》(*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1925*)和周锡瑞(J. W. Esherick)的《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这些研究都是从中国的地方省份出发,观察和分析传统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路径。

从研究主题上讲,日益从政治生活层面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马若孟(Ramon H. Myer)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是经济史研究专家,也是美国清史研究的专家,他著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1970年)是关于晚清和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对新中国前的华北农村进行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传统农业步入近代化的问题。相关的研究还有包德威(David Buck)的《中国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等^[7]。

第二次转变,主要关涉二战结束后冷战背景下东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态、利益与社会关系的探讨。该领域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著名的研究有斐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Labor*),力图以城市生活的变动来诠释中国的革命运动,揭示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诚如斐宜理自述的那样,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到《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她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8]。第三次改变,瞄准的是20世纪末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转型阶段,西方特别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成为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对世界的意义何在?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有什么区别?未来中国会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会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何种示范意义的文明?在此范畴里,研究内容丰富而广阔。诸如黄宗智(Huang Philip)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和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陈佩华(Anita Chan)的《陈村:革命到全球化》(*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通过跟踪一个村庄从最初的毛泽东时代如何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最后面对全球化的过程及其内部调整;顾林(Linda Grove)的《中国经济革命:20世纪乡村企业》(*A Chinese Economic Revoluti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则通过对湖北地区自民国初年一直到1978年以后的农村纺织业的对照研究,探索市场经济与乡村社会变动的联系^[9]。

近年来,中国研究领域愈加宽广,论文集《中国亲属关系:当代人类学视角》(*Chinese Kinship: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和《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和社会网络》(*The*

Flow of Gif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都是从人类学实地考察出发,来展示中国社会的变迁。在法律建设方面,陆思礼(Stanley Lubman)1996年的成名作《中国司法改革》(*China's Legal Reforms*),以及1999年的《笼中之鸟:后毛泽东时代的司法改革》(*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2005年的《法律在中国的应用:国家、社会和实现正义的可能性》(*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等侧重关注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10]。总的说来,北美中国研究的范畴由宏观到具体,领域愈加宽广。

3.2 “中国研究”方法日益实证化

费正清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之初,即认识到仅仅从历史学角度进行中国研究是不够的,由此奠定开放多元的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的风格。研究方法从历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再转向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强调对于中国的研究需要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图景的复原,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特质。比如黄宗智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明清商品化的研究,通过对“过密化”理论的引入和修正,提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导致近代化,根本原因在于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由此,过密化理论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认识视角和研究方法层面都对我国社会经济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邵东方曾开过一门汉学研究方法课程(*Si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在研究方法和证据使用方面提出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三原则,即识别古今之异、寻找发现证据和探究历史因果^[11]。斯坦福大学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教授所做的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就充分体现了上述三原则。人类学家背景出身的施坚雅主要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中国城市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施坚雅首先通过深入的比较分析,认为把中国的乡村理解为自然村落,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社会结构,周期性的庙会集市才是农村的基层市场社区。由此,施坚雅计算出了19世纪90年代全广东省的村庄数与市场数之比,提出形成中国乡村市场区域的正六边形模式。而后,使用这一模型分析了四川、浙江等地的农村社会,发现“十八村庄一市场”的模式在中国农村社会是

现实存在的,从而形成了一套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施坚雅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村落增长与市场变化的各类关系问题。

施坚雅模式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地理空间概念引入经济历史学研究中,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野^[12]。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对于施坚雅模式有诸多非议,但从方法层面看,施坚雅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他所提出的乡村基层市场六边形模型,成为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重要分析模式,被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广泛使用于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研究中。

事实表明,施坚雅模式的提出正是从考察现实问题出发,从事实比较和理论分析中形成假设或者说观点,而后通过实证加以检验,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框架。施坚雅分析模式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值得借鉴的研究工具之一^[13]。

3.3 “中国研究”资源的系统挖掘整理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自创立开始,就十分重视中文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不仅收集图书、报纸等文献,还收集图像、口述史料、统计报表、信件、货物账本等,出版了《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1839—1923年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清朝文献提要》等重要文献汇编^[14]。费正清形容自己所做的学术资源收集工作如同学术领域里的矿石开采者,北美中国研究领域的资料收藏与建设经验,无疑值得我国智库借鉴。

研究资料和研究数据的获取、收集和整理对于智库研究而言,不仅仅是工具,甚至就是研究本身。北美的中国研究非常重视实地调查报告和访问记录,重视统计资料、地方志、地方档案、报纸杂志、案件记录、回忆录、私人信件、宣传品、照片等资料的收集。这些资料给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素材,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收集的《杰德·斯诺·王私人档案》(The Jude Snow Wang collection)包括了大量20世纪70年度初期访问广东基层社会的笔记,以英文记录了当时广东农村的教育、经济、文化状态,是难得的基层社会报告。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馆收藏的《谭良所藏康有为保皇会资料》(The Tom Leung Collection),主要是300多封20世纪北美保皇会成员之间及与中国国内的往来信件,对于研究华裔社团、广东一带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知名大学通常会设有东亚研究系、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和东亚图书馆,

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所。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是一个收藏东亚,主要以中国、日本、韩国近代文献为主的学术图书馆,胡佛研究所着力侧重中国档案文献的收藏,涵盖20世纪以来大量珍贵历史和政治史料,包括蒋氏父子的个人日记、“文革”时期的报纸、海报和传单,以及一些特殊人物的回忆录和个人收藏。2005年还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黄宗智及其妻子多年收集的中国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包括2500件法律案件,时间跨度自晚清、民国政府到新中国时期。这些多元化的历史档案成为胡佛研究所进行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胡佛研究所也逐渐由东亚图书馆转变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智库^[15]。

在建设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伴随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愈来愈注重分析资料背后的逻辑联系,发掘其中潜在的规律。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李中清(James Lee)曾任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就极力倡导将量化数据库应用于历史研究。认为计量的研究方式不是为了确定原先的假设,而是通过数据库的统计挖掘去分析有没有重要的史实可以发现。他及其团队通过收集整理大量档案资料、社会调查、家谱、碑铭及口述资料,建立了18世纪至今的中国历史数据资料库^[16]。

4 我国智库研究范式的转型思考

上述案例分析,给我国的智库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落在研究方法层面,提示出三个重要转向:

首先,是在研究思维层面强调全球化的研究视角。需要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放到国际和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从而完成中国地方性知识和历史经验转化成具有全球意义话题的转变。从历史上认识世界,以及从世界认识中国变得愈发必要。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就是把长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长城对于中国只是北方的一堵城墙,但就整个亚洲来看却处于中央位置,跳出中国本土视野看长城、看中国历史,会带来全新的视域和不一样的结论,这一研究做法值得借鉴。

其次,是在方法层面强调定量的实证研究。对于智库研究而言,方法论和历史观其实是统一的。不存在孤立的方法论,方法和工具就决定了观察世界的立

场和眼界。实证研究强调研究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基础之上的,因此尤其重视一手资料的发掘、整理、收藏与出版,强调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通过各种数据关系和创建数学模型来对史料进行处理揭示,论证说明社会历史及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联系。对于智库研究而言,这将避免研究预设的偏颇以及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

第三,是在研究合作层面更多倡导跨学科协同研究。注重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围绕现实问题展开多维度研究,突出社会问题和现实应用。我国的南海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南海维权证据链及基础数据库建设,包括监测、提供海域和关键岛礁的动态变化,南海断续线的法理与历史依据专项,南海档案的系统整理与使用专项等跨学科研究。

5 结语

在一般理解中,研究模式似乎只关乎研究路径的具体展开与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实现,但实际上,研究领域拓展、研究主题的转变,甚至研究资源的发掘整理同样也是研究范式转变的一种标示。每一个新的研究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新的问题和切入问题的新起点,都拓宽了新的研究资源的来源。一个世纪以来的北美“中国研究”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主题领域几乎涉及了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的方方面面;研究方法层面,则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在研究资源的收藏和建设中,不仅重视一手资料的有针对性采集,而且注重采用网络数据库技术,以保证传统研究跟上数字化步伐。

中国的崛起是近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国际现象之一,如何在夯实研究的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建设成就,需要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层面调整研究视角,采用全球化思维,拓宽研究领域,把中国问题放置在全球框架下去认识研究,提出新的概念和观点是极为重要的;北美中国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时空范畴和研究视野,也带来了方法论的创新。基于量化数据进行扎实的实证研究,可以让智库研究更为纯粹,也更能国际所接受,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探究新型智库的研究路径和方

法,将会是智库研究面临的历久弥新的长期课题。

参考文献

- [1] 张志强, 苏娜. 国际一流智库的研究方法创新[EB/OL]. [2018-09-28]. http://www.bulletin.cas.cn/publish_article/2017/12/20171211.htm.
- [2] 游国龙. 国际问题研究范式探讨:以日本研究为例[J]. 日本学刊, 2016(6): 139-155.
- [3]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EB/OL]. [2018-09-28]. <http://nanhai.nju.edu.cn/5789/list.htm>.
- [4] 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55.
- [5] 叶文心. 当代北美学术界的近代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前瞻[M]//张海惠. 北美中国学.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09-215.
- [6] 杨念群.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EB/OL]. [2018-09-28]. <http://jds.cass.cn/Item/633.aspx>.
- [7] 陈静君.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EB/OL]. [2018-09-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a3c270100adxf.html.
- [8] 裴宜理. 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EB/OL]. [2018-09-28]. http://www.dedns.cn/lishi/1365642_6.shtml.
- [9] 程洪. 北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史研究考察[M]//张海惠. 北美中国学.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16-225.
- [10] 罗伟. 北美的中国法律研究概括[M]//张海惠. 北美中国学.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390-414.
- [11] 邵东方. 中国学术的分流与同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EB/OL]. [2018-09-28]. <https://www.sinoss.net/2010/0505/21296.html>.
- [12] 施坚雅.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5-54.
- [13] 任放. 施坚雅模式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 2006, 180(2): 39-49.
- [14] 赵晨诗. 论美国汉学到中国学的变迁——以费正清为中心[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7.
- [15] 陈英霞, 刘昊. 美国一流高校智库人员配置与管理模式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2014(2): 66-71.
- [16] 梁晨, 张浩, 李中清, 等. 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39—2002[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作者简介] 袁曦临, 女, 1968年生,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 东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吴琼, 女, 1989年生,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编辑。

收稿日期: 2018-10-08